

報人時代

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

杨雪梅◎著

侠义老板陈铭德
精明女管家邓季惺
委曲求全觅生路
半生襟抱付东流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三日

南京新民報晚刊

新報

HSIN MIN PAO
NAN KING

發行所：南京路三號
電話：二二二二
零售每份五分
本埠每月一元五角
外埠每月二元
廣告費另議

首都

鐘表眼鏡行

華貴鐘表
最廉我表

南京
新街口中山路五六號

D.D.T. 四季殺蟲藥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科學界最新發明殺蟲藥
無臭、無毒、植物人畜
無害、無害、無害、無害

我致政進步
甘乃光
自渝投京
器材北運

滬政治犯
要求保釋

中華書局
美第七艦隊司令
豁免去年人員

報人時代

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

杨雪梅◎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杨雪梅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8

(报人时代)

ISBN 978-7-101-05712-6

I. 陈… II. 杨… III. ①陈铭德—生平事迹②邓季惺—生平事迹③新民报—史料 IV. K825.42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8853 号

书 名 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

著 者 杨雪梅

丛 书 名 报人时代

责任编辑 刘树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712-6

定 价 28.00 元

序 言

1986年，陈铭德病危，以为将不久于人世，在向亲人话别时，他对妻子邓季惺说：“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大概是老天爷有感于陈铭德与邓季惺五十多年的风雨同舟，竟让他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直到1989年2月病逝，享年九十二岁。

他病逝的这一年，上海的《新民晚报》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岁生日。《新民晚报》一直把自己的生日追溯到1929年9月9日，那一天陈铭德与他的几位同事在南京创办了一份当时并不起眼的报纸——《新民报》。

1989年时《新民晚报》的日发行量已经创纪录地达到一百八十多万份，超过《羊城晚报》，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晚报。这个数字即使放在全国的报纸中也是相当可观的，仅仅位于《人民日报》与《经济日报》之后。报社的同事们抚今追昔，决定好好庆祝一下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日。

一生经历无数风雨的陈铭德却没能赶上这个有象征意义的“甲子”庆典。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有没有再想起自己当年亲手缔造的那份辉煌——在抗日战争后期，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的日、晚刊最高日发行量曾超过十万份，影响力为后方报业之翘楚。日本投降后，

《新民报》南京版率先复刊，上海版、北平版相继开办，在短短一年时间，“新民报系”不断扩大着自己的版图，创纪录地拥有了五社八版，成为当时旧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陈铭德与邓季惺也因此被称为是“报业大王”和“报界鸳鸯”。

曾经在《新民报》上海晚刊工作过的吴祖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陈铭德为“创造历史的人”，他的理由很简单，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动荡的年代，政治形势扑朔迷离，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即使是个人的生存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况且是一张标榜“民间立场”、时时同统治集团唱对台戏的私营报纸！据统计，进入民国以后，一张报纸的生存期限平均不超过三年，存活期限超过五年的报纸多半是有后台的党报、官报，在1948年每天被政府以各种理由封禁的报刊多达五十多家。而以陈铭德为核心的一群新民报人能够在坚持“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理念的同时，做到在五个城市出版八种报纸，这样的规模与气势，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也并不多见。

《新民报》常常被陈铭德比作“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营养失调”的婴儿，它是在一批报人呕心沥血的努力下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中成长起来的，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它才刚刚度过自己的二十岁生日，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年代。然而戴着“报业资本家”这顶帽子的陈铭德与邓季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担惊受怕，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也属于“牛鬼蛇神”之列，所幸的是他们被认为是“死老虎”，才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

但从此他们便遗憾地离开了施展抱负的大舞台，曾和他们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新民报》与他们的人生不再有关系。在孙辈眼里他们只是慈祥的爷爷奶奶；在普通大众的眼里他们只是谦逊的长者，他们的朴实无法让人联想到他们曾经出版发行过旧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是和他们的报纸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

的旗下曾经大将云集，在重庆这个抗战的大后方，《新民报》是百姓最爱看的报纸，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接见过报纸的重要人物赵超构、张恨水……

落尽繁花春早歇，西风苦自吹黄叶。改革开放后，都市报与晚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民报》连同它独特的新闻风格一次次被提起，一去不复返的“三张一赵”的豪华阵容又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活在许多人记忆中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一页页打开了。人们知道曾经有一对夫妇、有一群报人为了办好一份民间报纸鞠躬尽瘁，有一群自由主义者曾经为了实现“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个崇高的理想竭尽全力。然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剩下的也已经垂垂老矣……

新闻史本该对他们进行浓墨重彩的铺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中国报业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新民报》辉煌时期形成的“五社八版”，堪称跨地域的“大报业集团”，形成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新民报系”，这样的报系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成为绝版，直至今天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办报经历和兴衰成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经典意义，是不可复制的范本，对于我们研究那个年代的新闻环境、新闻政策、新闻报道都是不可多得的素材。

这也是我们执意要找回那段华彩乐章的原因。而且随着你一步步亲近那些发黄的、残缺不全的、甚至是劣质（抗日战争时后方的报纸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用粗糙的纸来印刷）的报纸，那些国恨家愁、人情世态和着巴山夜雨便一起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毫不夸张地讲，通过《新民报》那些行云流水的文字、古典精致的标题，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回到那风雨如晦的岁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部分 报人夫妻 /1

一、侠义老板陈铭德 /2

早岁已知世事艰 /2

黄金累千不如揽得一贤 /7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12

二、精明女管家邓季惺 /16

一家三代企业家 /16

刘备得到女诸葛 /23

开疆拓土勇拔头功 /30

三、委曲求全觅生路 /36

与其求诸人不如先求己 /36

能屈能伸大丈夫 /40

屈辱复刊与永久停刊 /43

四、半生襟抱付东流 /48

放弃办报退出历史舞台 /49

双双做了“牛鬼蛇神” /56

第二部分 《新民报》生命簿 /62

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65

赢得“敢说话”的名声 /66

建立现代化经营模式 /70

二、西迁重庆转战成都 /75

重庆:地利人和开创新局面 /76

晚报:《新民报》竞争的新武器 /81

成都:《新民报》易地设立分社之始 /82

八字方针:“中间偏左遇礁即避” /86

三、五社八版,报业奇迹 /89

五社八版:旧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 /90

中间立场难觅生存空间 /94

四、御笔亲封,余音绕梁 /101

中间偏左引来杀身之祸 /101

新仇旧恨终招封门厄运 /106

中外舆论抗议出版不自由 /109

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112

第三部分 笔底波澜 /118

一、山雨欲来:《新民报》的社会新闻 /121

四两拨千斤:社会新闻掀起大风浪 /123

揭开“杨妹不食”的秘密 /127

二、凌云健笔:浦熙修的政治新闻 /129

秀外慧中的“天窗”记者 /130

无冕之王智斗外交官 /132

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 /136

三、万紫千红:五社八版的副刊 /137

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发表 /139

副刊并非与抗战无关 /143

“摩登论语”与“七星聚义” /145

四、微言大义:《新民报》不同时期的评论 /149

坚持抗战到底:抗战前后的言论 /150

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抗战胜利后的言论 /155

第四部分 《新民报》群英谱 /160

一、人生长恨水长东:张恨水 /163

雅俗共赏自成一派 /164

国难当头以笔为剑 /172

新闻苦力卖文一生 /178

二、独领风骚数十年:张友鸾 /182

新闻全才标题王 /182

是真名士自风流 /190

老夫再发少年狂 /194

三、一生慧剑竟空挥:张慧剑 /198

但开风气不为师 /199

书生意气赤子情 /204

四、一笔曾当百万师:赵超构 /209

《今日论语》点评天下 /210

《延安一月》:讲述一个真实的延安 /215

与毛泽东的多次见面 /222

名字与晚报共存 /225

五、桃花潭水深千尺:报人情谊 /226

尾声 不立异以鸣高,不逆情以沽誉 /231

附: 陈铭德生平年表 /236

邓季惺生平年表 /242

第一部分 报人夫妻

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夫妻办报的例子并不多。

在陈铭德与邓季惺之前，邵飘萍与夫人汤修慧创办的《京报》在北方十分畅销，后来邵飘萍不幸被军阀杀害，汤修慧一人独立支撑《京报》，苦心经营多年后被迫放弃。陈铭德与邓季惺的办报经历显然要比他们复杂得多，持续的时间更长，取得的成绩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陈铭德求贤若渴，长于“外交”，他用北大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办报，无论信仰如何只要文章写得好都可以来《新民报》作记者、编副刊，因而报纸一度荟萃了文化界的大量名流。同时他在政界、工商界、军界也有大量的朋友，为《新民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赢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邓季惺，被称为陈铭德的女诸葛，是罕见的经营管理奇才，有名的女报业大王，“新民报系”的鼎盛有她一半的功劳。是她以自己的远见、果断、精明使《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最后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间报系。

况且，和大多数的报人相比，他们夫妇两个人的长处并不在于舞文

弄墨，而在于报纸的经营管理，他们既坚持了同人办报所追求的“文人论政”的理想，又摆脱了同人办报单纯“言论报国”的模式，在经营管理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成为发行量与广告收入都非常可观的报纸；和其他“在商言商”的商业类报纸和官办的党报相比，他们因为追求经济的独立与“超党派”的民间立场而享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他们当年的结合就曾经让世人大开眼界，既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又多少出乎大家的预料。他们把自己在南京的新居起名为“鹤庐”（鹤，音 jiān，比翼鸟）。陈铭德喜好美食，邓季惺擅长烹饪，一桌的川菜常常吊足大家的胃口。高朋满座时，新朋旧友莫不感慨他们的性格迥异却又珠联璧合，他们的传奇足以让所有人羡慕……

一、侠义老板陈铭德

广交游、轻货财、重然诺、急人之所急，这是中国古代对于侠客的标准描写，也是陈铭德所具备的性格特点。但与陈铭德共过事的人都说，初见这位个头不高的老板时，谁都不会把他与侠客联系在一起。

曾有一些报界老人认为陈铭德有用人之心，也有容人之量，只是在识人方面略乏慧眼。其实从《新民报》的发展来看，陈铭德亦有识人之眼，否则一张小小的报纸如何能够召来济济人才，令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在旧中国想要办一份成功的民间报纸非常不容易，想让这份报纸健康成长更不容易。陈铭德并没有多么显赫的家世和背景，也没有雄厚的资本与财团支持，他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依靠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新民报》是他一生最大的奇迹，那起点又在哪里？

早岁已知世事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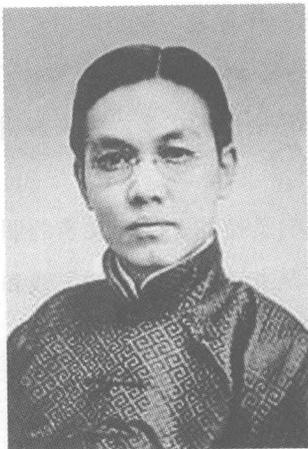
人们习惯称陈铭德为“刘备”，只是这个刘备在创业之初连“刘皇叔”这样的虚名都没有，他有的只是一份办报的理想，一份为实现理想而有的灵活与坚持……

陈铭德的家庭同当时中国上千万的家庭一样普通。他是四川长寿县人。六岁那年，在重庆一家川货庄当职员父亲的，去汉口做生意亏了本，被东家诬陷为贪污营私。一时间有口难辩，刚烈的父亲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

这件事不但使陈铭德幼年失怙，而且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的朋友挺身而出，让东家给了一笔不多的抚恤金，从此一家人就靠这笔钱和亲友的资助艰辛度日，陈铭德也得以接受完备的教育。小学毕业之后，他独自一人去重庆上中学，1919年只身出川考入北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受“五四”精神的影响，立志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与富强。1922年还是大学生的陈铭德经谢持、张继介绍，与王昆仑一起加入了国民党。

这样的出身与家境居然也成为陈铭德的财富，成为他能够招贤纳士用人所长的原因之一。因为家境贫寒，资质中等，又没有过人的才气，他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聚众人之力。这样的家庭背景也给了他足够的坚韧，在任何困难与挫折面前都能够冷静对待，从不轻言放弃；这样的背景也使他能够平易待人，几句寒暄就给人以如坐春风的感觉。

还在学校时陈铭德便在课馀兼任北京《国民日报》的编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24年陈铭德从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北京对陈铭德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当时在北京有林白水、邵飘萍等大批杰出报人。邵飘萍1917年10月以个人的力量在北京创办大型报纸《京报》，希望能够“平社会之不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伏于舆论之制裁”。报纸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六千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创刊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馆舍。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社会力量来办报，1924年《京报副刊》出版，孙伏园主编，以新文学的内容为主，改变了副刊过去“报屁股”的形象，特别受到学生的欢迎。《京报》后来出版过



邵飘萍

《莽原》等二十三个副刊,集中了一大批学者与作家,大大提高了副刊的质量与地位。邵飘萍不但采访有方,管理有度,而且一生仗义疏财,颇有些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气。1926年他因上书直言被军阀杀害,是我国新闻史上以言罹祸的最大悲剧。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著名报人成舍我亦在北京从事办报活动,他利用军阀统治的混乱局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接连创办了以“世界”命名的晚报、日报、画报,创造了北京历史上一个人同时出三份报纸的先例,在华北地区影响颇大。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就是因为积蓄太少不够维持日报的开销。当时晚报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半,社长成舍我,总编辑龚德柏,经理吴范寰,编辑张恨水(兼职)。

1926年,盘踞在北京的军阀对发表不利于他们言论的新闻记者进行了暴力镇压,成舍我也被逮捕,经孙宝琦向张宗昌求情后才得以保释。成舍我随后来到南京寻找新的出路,于1928年创办了《民生报》,发行量最多时达三万份,超过了南京《中央日报》。

应该说邵飘萍和成舍我的办报经历对陈铭德是有影响的。当年傅斯年曾对胡适说:与其入阁,



成舍我与家人

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办报是当时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以民间的独立地位来参政议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陈铭德正是在那时确立了办报的理想,他在解放后曾回忆说:“办报是民主政治下光辉的事业,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既清高又有利于往上爬,就决定走新闻工作的路吧,把办报作为一生生命的归宿。”

陈铭德从北京回到四川,先后在成都法政专科学校教新闻学、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大中华日报》主笔。1928年又被邀请去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作编辑,一度还兼任《华北日报》驻京特派员。到中央通讯社工作不久,陈铭德便对刻板的工作方式和国民党钳制舆论的做法产生了不满,他认为国民党的新闻政策与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相去甚远,创办一份民间报纸的想法越来越清晰。

陈铭德的想法得到了曾经一同受聘于《大中华日报》的四川籍同事刘正华、吴竹似的支持,他们立刻开始了筹备工作。陈铭德辞去了中央通讯社的职务,回到四川筹措办报所需要的资金。

在四川,陈铭德得到了军阀刘湘的支持。刘湘资助他启动资金两千元大洋,以后按月支付津贴五百元大洋,同时还给陈铭德个人活动经费每月二百元大洋。有了这笔资金再加上刘正华、吴竹似的支持,《新民报》便于1929年秋天创刊了。“新民”取自《诗经》,有“作育新民”的意思,同时还含有继承与发扬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时期创办的《民报》的精神。报头上的“新民报”三个字,就是由精于书法的吴竹似从孙中山先生的遗墨中摹写下来的,就连报纸选在9月9日这天创刊,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新民报》创刊两周年时,陈铭德在纪念专刊中撰文,提出以四事与同人共勉:一是传达正确消息,二是造成健全舆论,三是促进社会文化,四是救济智识贫乏。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谈何容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拿了人家的钱自



《新報》的三位創始人，從左至右：劉正華、陳銘德、吳竹似

然要替人家說話。當時的《新報》，經常刊登的內容便是中央社的稿件和劉湘集團的文治武功，這和他理想中的報紙顯然差得太遠，在報館如林的市場也根本無法立足。剛開始發行只有二千份，大部分還是贈閱，廣告收入每月只有二百來元。陳銘德和吳竹似、劉正華只好經常到夫

子廟的茶館扮演忠實讀者的角色，在人堆里爭購剛剛出版的《新報》，乘機向周圍的人宣傳《新報》如何如何好看，言論如何如何公正。

陳銘德從一開始便四處化緣，來維持報社的開支。陳銘德回憶說：“說來可憐，機器等紙開印，伙房等米下鍋，這樣的日子是常有的啊。”陳銘德對報社大大小小的伙計，無不解衣推食，真誠相待，很有些桃園結義的味道。許多職工因為《新報》根本無法給他們發工資，只好在外面兼一份工作，業餘時間再到《新報》來工作，甚至把從別處掙到的錢投到《新報》。報社的一個會計因為會做四川咸菜，就在報社旁邊開了一家“川香遠”的咸菜鋪，仅有的收入也貼補了這張新創刊的報紙。陳銘德說自己剛剛做好的衣服來不及穿，就不得不送到當舖，其艱苦可見一斑。

報紙創辦不久，總編輯吳竹似便因為生病前往北京休養，而劉正華也因為條件太艱苦離開了報社。陳銘德一個人的心情是相當苦悶的，

他这个刘备需要左膀右臂，需要诸葛亮，报纸也需要走出困境。

黄金累千不如揽得一贤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陈铭德在最困难时得到了第一员大将——张友鸾。

这员大将是位不可多得的办报全才，虽然几次离开《新民报》，但在《新民报》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适时出现，对报纸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新民报》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张氏印迹。

张友鸾是安徽安庆人，就读于北京的平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难得的受过正规新闻教育的报人，深得邵飘萍、成舍我的赏识，曾在《京报》编辑文学周刊，并在成舍我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担任总编辑。张友鸾对民间报纸同样情有独钟，他誓言要做一个“超政治的新闻记者”，这和陈铭德的主张不谋而合。

张友鸾代替吴竹似担任《新民报》总编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明确报纸的读者对象。他与陈铭德商量，报纸应该以青年学生、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更广泛的刊登一些青年喜欢阅读的东西，宣传民主思想提倡爱国主义，为平民百姓讲话，揭露批评社会弊病。在编辑方面，他提出文章要短小，标题既要讲究文学性，同时又要通俗易懂，诗词曲赋谚语民谣均可入题。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编排版面，版面要显得疏落有致，灵巧活泼。这些观点便成为《新民报》最初的风格。

陈铭德毕竟是一个书生，他最缺乏的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经验。随着“九一八”事件的发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际国内的形势都日趋复杂，一张报纸确定怎样的言论方针，如何对国内国际大事发言，成为陈铭德考虑最多的问题。言论报国，如果言论发生偏差，不但报不了国，而且会让报纸死无葬身之地。陈铭德迫切地感到自己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助手为他廓清迷雾，为他掌握航船的方向。

1935年罗承烈加盟《新民报》，这让陈铭德喜出望外。罗承烈是四